

勞動市場區隔論對教育計畫的啓示

陳憶芬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不少四技二專升格為大專院校，以及新上任教育部長的魄力，使去年日大聯招總錄取率接近50%（中央日報，民85a）。大學的窄門似乎愈來愈寬廣，配合政府獎貸學金制度，還有各校為吸引優秀學生所擬定的「特惠專案」，大學之夢對窮人子弟不再遙不可及。相對地，受到經濟不景氣及大專畢業生數量增加之影響，專上程度失業率快速攀升，去年前五月失業率已達2.5%（聯合報，民85）。因此，高等教育不再只是面對「廣設高中大學」的增設系所問題，未來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選擇與出路，成了另一項引人注目的焦點。

早期高級人力欠缺時，「人力資本論」（the human capital theory）頗能解釋教育與就業市場之關係：接受更高的教育，得以充實個人的能力，以提高個人的生產力，因而增加了個人的就業機會，且表現於較高薪資所得上。然而，曾幾何時，高等教育人力亦出現了供過於求、人浮於事的現象。在有限的工作機會中，雇主如何從一批具備同樣高等學歷的求職者中取才，也許個人的家庭背景、社經地位或人際關係網絡便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此種現象，並不是新古典教育經濟學的人力資本論所能解釋的。新興的理論中，或許勞動市場區隔論（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本文主要目的有三，其一為瞭解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理論要旨，以便從不同於人力資本論的角度討論教育與勞動市場之關係；其二為整理國內外有關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相關研究，以瞭解此理論於實證上獲支持的程度；其三則由勞動市場區隔分析其對就業市場的影響，藉以討論對教育計畫的啓示。本文依此目的分為三個主要部分，最後再加以總結。

貳、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理論基礎

勞動市場區隔論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雙重勞動市場（the dual labor market, DLM）理論。此理論是在六〇年代末期由兩位經濟學家Piore和Doeringer所提出。這是對人力資本論的明顯挑戰。以下將說明此論意涵，並以此論的觀點，討論教育在勞動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一、涵義

Piore和Doeringer認為，有理由把勞動市場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因而稱之為「雙重勞動市場」模型。這兩部分叫做主要部分（primary segment）與次要部分（secondary segment）。兩部分並不是按特定的職業或行業所定義，而是按一組共同的特徵定義的（Ibid.：209）。主要市場的工人，擁有受訓機會及工作流動的階梯，其就業穩定、工作條件好、工資較高、有較多晉升機會（Cohn & Geske, 1990: 65）。而次要部分的工人，通常是臨時受雇，往往工資福利低、工作條件差、勞力流動多、提昇機會少，而且時時受到專橫任性的監督。次要部分的工作所提供的在職訓練機會少，甚或無，它們是「沒有出路」的工作（崔偉、張志強譯，民80：209-210）。

二、工作結構與薪資

兩個部分勞動市場的結構是明顯不同的。次要部分實質上是外部勞動市場，它靠競爭力來決定薪資及雇用（McNabb, 1986: 160），本質上是個競爭市場。而主要市場卻多為內部勞動市場。如此於結構上的差異，亦使二者的薪資決定有明顯的不同。

對次要市場而言，由於屬競爭市場，因此工資傾向處於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均衡水準，加上技術要求較低以及缺乏在職訓練，其薪資通常很低（崔偉、張志強譯，民80：210）。

但主要部分並不是競爭市場，大部分是內部勞動市場。內部市場薪資結構的運作，把特權地位授與「內部人」（已經受雇的人），消除公司內部競爭，使薪資管理的程序，能以降低成本、降低個人薪資決定的衝突競爭之方式建立。因此，在內部勞動市場中，薪資及雇用受機構或管理規則與程序決定，而不是受經濟變項所決定（McNabb, 1986: 160）。

三、工作部門的工人分配與工作流動

（一）工人分配

工人分配方面，涉及哪些工人可以進入主要市場，哪些工人必須安置於次要市場。由於就業市場的供給上，符合資格的求職者人數遠多於工作數目，因此，必須在眾多合格者中挑選所需的員工。

然而，某些團體的工人有更大機會進入次要市場，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不好的」工人，而是因為他們受到歧視（McNabb, 1986: 160-161）。Piore和Doeringer認為，在選擇的過程中，歧視、裙帶關係、私人交易、甚至運氣產生很大的作用。而實際上最可能被排除的工人是傳統上的受害者—黑人、拉美人、新移民、非法越境者、青少年以及許多婦女，他們成為次要部分的主要勞動力（崔偉、張志強譯，民80：211）。

雙重勞動市場經濟學家研究貧民勞動市場，使他們主張對少數團體，如黑人及婦女的歧視，代表某些具有進入主要市場所需教育資格的人，最終仍只能從事次要市場的工作。膚色及性別被雇主用作篩選機制，以辨識具備特殊行為特質的人（McNabb, 1986: 160-161）。勞動市場制度結構和歧視的作用遠比人力資本投資重要得多。

(二)工作流動

在工作流動方面，Piore和Doeringer認為從次要部分到主要部分，存在著有限的工作流動性。首先，企業特殊的在職訓練造成兩部分工人的自然劃分，未受訓練的次要部分工人，與受過訓練的工人競爭內部勞動市場的工作時，處於不利的地位。其次，在次要部分就業常使工人不適合在主要部分就業。次要部分的就業產生一些工作習慣，如缺乏動力、工作消極、曠工、不尊重上司、佔小便宜等，這在原職可以容忍，但在主要部分則十分不宜。兩部分行為狀態如此迥異，以致一旦習於在次要部分就業，到主要部分求職的可能性就變得很小（崔偉、張志強譯，民80：210-211）。此外，少數團體進入主要勞動市場，一方面會為主要市場的工人帶來威脅；另一方面，雇主認為少數團體的工人缺乏穩定性與可靠性，都阻礙他們在主要市場的就業機會。

四、教育的角色

(一)教育與生產力

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的形成，投資於教育，便等於投資於人力資本。因此，教育程度愈高，代表具備較高的生產力，而此等生產力便反映於薪資所得上。

然而，雙重勞動市場經濟學家認為，強調教育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資本對於決定薪資及分配勞力的重要角色是沒有保障的。教育的變異及其他與生產有關的個人特質不一定反應於所得的差異上（McNabb, 1986: 160）。次要市場中，雇主對員工的不同特質漠不關心，不會對他們的有利特質加以酬賞，只要一視同仁，就好像大家的生產力都相等。因此，與人力資本論相反的是，次要市場中，高教育水平並不會反映出高所得。

(二)教育是一種篩選機制

根據雙重勞動市場經濟學家的看法，教育是一種篩選機制，經由此一機制，可以辨認出具備某些特殊屬性及行為特質的工人。教育並非提昇勞工生產潛能的方法，而是提供工人進入特殊類型職業的管道。但即使如此，仍不能過度強調教育的重要性（Ibid.: 161）。教育只是雇主所用的眾多篩選機制之一，其餘如種族、性別等因素，可能比教育更具決定性。因此，就算少數團體工人的整體教育水平已經提高，但種族之間的差別待遇仍然存在，這種現象被視為勞動市場區隔的證據。

雙重勞動市場經濟學家特別強調個人的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其教育成就。不同地區社會條件的差異，反映出居住其中的人們獲得職業的本質。結果，在低所得地區的人們，擁有較差的居住品質及學校品質，以及抑制教育成就的價值觀及態度。因此，個人及其家人，並不是在成本及收益的基礎上自由選擇不同人力資本投資的人。對許多人而言，選擇受限於環境、決定於環境，以及既存的工作機會類型。

參、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相關研究

有關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研究，以國外文獻，尤其是英、美等開發國家的研究較多；至於一般開發中國家，則多以美國學者，如Carnoy、Psacharopoulos等人所發展的模式作為研究架構，以探討各國勞動市場是否具備相同特性。國內相關

的研究，則以勞動市場的薪資決定因素較多，其中又以男、女的所得差異為主。至於專就勞動市場區隔現象之研究，則以林旺福（民81）的研究最為典型。林氏探討不同年齡及性別是否會對勞動市場造成區隔。研究發現，成人男性、成人女性、年輕男性、年輕女性這四層勞動力並非完全處於競爭市場，而是互相隔離的（林旺福，民81）。這顯示台灣勞動市場就年齡與性別而言，具有區隔的現象。

國外這方面的研究頗多。除了對勞動市場薪資決定因素的研究之外，不乏針對雙重勞動市場假說及勞動市場區隔的研究。然而，研究結果頗為分歧。

一、支持勞動市場區隔論之研究

Eliason（1989）研究1979至1985年美國年輕人最初的勞動力職業過程，Neuman and Ziderman（1986）檢視以色列的雙重勞動市場假設，Robinson（1984）研究職業傷害的社經脈絡，Tokpa（1988）研究賴比瑞亞鄉村地區教育及其他變項對個人所得的影響。結果均支持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研究，發現具有不同特質的勞動市場存在。或者是起薪不同、或者是職業安全保障之不同、或者是所得之不同。一般而言，種族和性別是差異的最重要因素。

二、未支持勞動市場區隔論之研究

Campbell（1984）研究高中教育及職業抱負，不認為高中是雙重勞動市場的管道機制。Flanagan（1974）研究發現不同種族間離職或解雇率差異甚小。Leigh（1975）的研究結果顯示，並無證據支持黑人人事異動因受限於次級部門的工作而無法導致升級。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未支持勞動市場區隔論者，或支持人力資本論，相信教育對勞動市場薪資所得的影響；或認為種族歧視與差異並未如想像中嚴重，在勞動市場上，黑人仍與白人享有同等的升遷機會與離職率。

三、綜合模式之研究

最後，是綜合人力資本論、勞動市場區隔論及其他理論，來解釋勞動市場的現象。El-Garid（1987）檢視利比亞人力資本、文化資源及經濟結構對社經成就過程的影響。分析顯示，統整模式是預測成就較好的工具，因為比起單獨的地位取得／人力資本模式或雙重經濟模式，統整模式的界定較完整。

Jeffries（1987）研究少數民族選擇職業訓練課程的影響因素。其結果並未全面支持雙重決策假說，亦未證實人力資本模式及其所隱含的經濟行為的所得最大化理論。

Snipp（1981）研究結果與地位取得的文獻相一致。亦即，個人初職的結構配置，多為教育的函數。但對於每一部門的所得決定模式之研究，則發現相同因素亦影響所得；只是不同部門間的影響強度有顯著不同。

Yip（1988）研究顯示，開發中國家工人所得不平等的現象，比資本主要工業化國家高。大部分國家，職業是決定所得的最重要因素。一項對於所得及勞動市場區隔的研究，並未支持所得決定中，人力資本因素在核心部門比周邊部門重要。

綜上所述，發現不同的研究，或以結合不同理論（如：人力資本論、地位取得模型及勞動市場區隔論）為主；或強調教育（即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勞動市場區隔不一定是決定就業或薪資的唯一因素。

肆、勞動市場區隔論對教育計畫的啓示

雖然國外有關的研究並不完全支持勞動市場區隔論或雙重勞動市場假說，但，傳統人力資本論對於解釋勞動市場歧視之現象有所不足，則是不爭的事實。勞動市場區隔論提供了另一思考向度，藉以瞭解勞動市場的全貌。同時，除了教育在勞動力的供給面所扮演的角色之外，究竟教育應如何自處，亦是一大問題。教育學者杜威認為教育無外在目的，依此而論，教育似乎不必太過擔心學生未來在就業市場是否得以謀得工作的問題，而較應思考教育的本質問題。然而，從計畫經濟與教育計畫的觀點來看，教育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當政府把國家預算大餅切一塊來辦理教育的同時，亦希望未來能有所報酬。同時，人力的培養若無法與就業市場相結合，不但會形成資源的浪費，也會造成失業及相關問題。最近社會高唱「高學歷高失業」，亦是此類問題之反映。因此，除了人力資本論之外，從區隔論來思考，也許可為教育計畫帶來一些啓示。

一、教育的內容應著重工作態度的培養

Nation (1976) 研究發現，主要及次要市場兩領域中，最重要的差別是教育與態度。目前人力訓練計畫一般只著重於工作技能教育，在態度改進及人際關係技巧上的訓練有限。這些計畫能否成功令人質疑。另一方面，有些社區學院的課程，統整人際發展教育與技能訓練，結果比只提供工作技能教育要好。因此應於教育及訓練的課程中，重視工作態度的培養與人際溝通的技巧，以拉近次要市場工人與主要市場工人在工作態度上的差距，增進其工作流動的機會。

二、教育與訓練應配合就業政策的改革

區隔論的激進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雇主會保留一批失業人口，以便利社會運作 (Carnoy, 1977: 159-170)。因此，從政策觀點，給這些不利團體更多教育並不會提高其就業能力，因為這是勞動市場的本質 (Carnoy and Levin, 1976)。為使教育擴展及改革能有效達成經濟及社會變遷，必須伴隨就業政策，而且要創造更多「主要的」工作，或改變次要市場的就業條件及薪給。增加主要市場的工作數量，並拉近主要市場與次要市場在工作環境及薪資所得上的差距，是促進教育與訓練效率的有效途徑。

三、教育計畫必須配合所得均等政策

教育計畫與決策者須體認，教育無法獨立於社會及市場的發展之外 (Kraft and Nakib, 1991)。計畫者必須鄭重考慮受過教育、受過訓練的工人需求，注意其對薪資結構、失業及勞力異動的效應 (Mincer, 1989)。根據區隔論的研究，發現政府的所得政策對於所得分配的影響，要比工人個人特質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強得多 (Carnoy, 1977)。教育計畫若未伴隨相關的所得均等政策，則提昇教育與消弭貧窮之間，不一定能得到預期的結果 (Manrique, 1993)。

伍、結語

本文由「高學歷高失業」的省思，大學聯招錄取率的增加，思考未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引發人力資本論及勞動市場區隔論的探究，並進一步討論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理論內涵，發現在涵義上，雙重勞動市場包括兩組不同特性的勞動市

場：主要市場與次要市場。前者工作環境、條件及升遷管道均優於後者，而後者流動率高，且工作不穩定。在工作結構與薪資方面，前者屬內部勞動市場，一旦進入，對往後的升遷即有保障；而後者屬外部勞動市場，就業受競爭市場影響，薪資結構受勞力供需所左右。在工作部門的工人分配與工作流動方面，次要市場工人多為婦女及少數團體，因其受到勞動市場歧視，較難進入主要市場；一旦習於次級的工作習性之後，就很難再向主要市場流動。至於教育，不一定能提高生產力，充其量只不過是雇主所用的一種篩選機制而已。

其次，本研究蒐集有關勞動市場區隔論的相關研究，發現部分研究支持區隔市場的存在，部分則否。另一些研究則嘗試結合人力資本論、區隔論甚或地位取得研究，以共同解釋勞動市場不同的現象。

最後，本文探討區隔論對教育計畫的啓示。教育不能自外於社會、政治、經濟的大環境，為使所有學習者，以及次要市場的工人能適應主要市場的工作，以增進其職業流動的機會，教育內容應著重工作態度的培養。其次，為落實教育的改革，教育計畫應能配合相關的就業政策，就業政策一方面應增加主要市場的工作，以容納相同水準的工人，避免因種族或性別所產生的歧視；另一方面，亦應改善次要市場的工作環境與薪資結構，以拉近二者之間的差異。最後，教育計畫應能伴隨所得政策，以真正使高學歷、高能力者，擁有較高薪資，達到所得均等化的目標。

教育的目的雖言人人殊，但教育與就業市場的關連則不容抹煞。一個好的教育計畫，除了能預測未來勞動市場所需的人力並加以培訓之外，藉教育以達到就業與所得的均等，亦不容忽視。也許勞動市場區隔論，能提供教育計畫者如此的省思。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大學聯招加額錄取最快今年開始實施”（民85年7月10日）。中央日報。
- “畢業好就業，大學競促銷”（民85年7月6日）。中央日報。
- 林旺福（民81）。台灣勞動市場區隔之探討。台灣經濟金融月刊，28(8)，29-34。
- “專上程度失業率快速攀升”（民85年7月10日）。聯合報。
- 崔偉、張志強譯（民80）。勞動力市場經濟學（Hoffman, S. D. 原著）。台北市：五南。

英文部份

- Campbell, Paul B. (1984). *Curriculum and aspirations as elements of transition patterns between schooling and work*.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42 937).
- Carnoy, M. (1977).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 Carnoy, M., & Levin, H. M. (1976). *The limit of educational reform*. New

- York: David McKay.
- Cohn, E., & Geske, T. (1990).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 Doeringer, P. B. (1969). *Low income labor markets and urban manpower programs: A critical assessment*.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045 946).
- El-Garid, E-T (1987). Economic segmentation, kinship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in Liby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1988).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2467, 4809A.
- Eliason, S. R. (1989). Young adult labor force careers in the U. S., 1979-1985: An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stratification and attainment proces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0).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3374, 5010A.
- Flanagan, R. J. (1974). *Labor turnover, racial unemployment differentials, and the dual labor market hypothesi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095 308).
- Jeffries, J. M. (1987). Black and white choices of postsecondary noncollegiat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1987).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674, 5503A.
- Kraft, R. H. and Nakib, Y. (1991). "The 'new' economics of education: Towards a 'unified' macro/micro-educational planning polic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37(3), 299-318.
- Leigh D. E. (1975). *Male occupational mobility between 1965 and 1970: Evidence from the 1970 censu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11 917).
- Manrique, A. T. (1993).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Changes in schooling,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distribution in Peru, 1961-1972.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3738, 5311A.
- McNabb, R. (1987). Labor market theories and education. In G. Psacharopoulos (Ed.),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tudies*. New York: Pergamon.
- Mincer, J. (1989). Human capital and the labor market: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4), 27-34.
- Nation, W. C. (1976). *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the community college*.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36 889).
- Neuman, S., & Ziderman, A. (1986). Testing the dual labor market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the Israel labor mobility survey.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1(2), 230-237.

Robinson, J. C. (1984). Work and health: An economic and policy anal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5).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2955, 4509A.

Snipp, C. M. (1981). The structure of mobility: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mobility and achievem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2).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3784, 4208A.

Tokpa, H. F. (1988). Education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income among head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Liber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89).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2173, 4908A.

Yip, Kam-Bro (1988). Income determina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9).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3881, 4912A.

真理與知識

趙仰雄

理想主義主張真理是絕對的，它認為真理決不改變，雖然人們對它的觀念改變；相反的，杜威卻以為接近真理只有一條肯定的途徑——經由觀察、實驗，與控制思考而產生的協同探討。有人認為教育包含了教導，教導產生了知識，知識即是真理；杜威認為知識應是從做中學的產物，除非是從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此外並無真知大悟的事物。這是杜威以實踐主義聞名於世的基本定理，而與儒家思想劃界的分水嶺，特別是和宋代的理學——新儒家思想完全異趣：「對於事實的分析和重組，是知識成長和解釋能力不可或缺的過程，正確的分類，不能僅依純粹的心智——侷限於頭腦內部的思考來達成；人類如要發現或發明某一新的知識，除了心智和頭腦的思維外，必須對該一事物有所作為；他們必須改變形勢，這是實驗室方法的課題，這一課題，所有教育者必須加以學習和效法。」

美國由於實踐精神的導航，故在科學的真理上領袖群倫，不久又將擴充領域至外星，其種種成就，值得頌揚；但如何導使科學的真理，走向人類永久和平福祉的道路，仍應在哲學與倫理的範疇內去找知識，此所以他們的哲學家亦在努力如何使科學與倫理相結合，不再使二者分離對立。